

## 章太炎为何与孙中山分道扬镳？

章太炎是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，他与孙中山既有过并肩奋战的岁月，也有过激烈争辩乃至分道扬镳的日子。其中原因种种，本文从一个角度给出一种见解。

金满楼

### 不同于主流历史描写的场面

1905年同盟会成立大会上，台下听众突然起身诘问正在演讲的孙中山：他日革命告成，先生其为帝王乎？抑为民主乎？请明以告我！

此言既出，全场皆惊。演说正酣淋漓的孙中山听后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。事急之时，宋教仁的好友、会议组织者程家桢出面解围：今日之会，惟研求清廷之当否革除，不当问帝王民主。

辛亥革命是一场共和革命，革命者自然无帝王之念想——事实上也完全做不到。1911年12月25日，孙中山回到上海。据南社社员徐宗鉴描述，当时前

去迎接的，“商界仅王一亭，政界仅李平书，其余仅英士（即陈其美）与余两人。”这等场面，与主流历史所描写的“万众欢呼”、“夹道欢迎”相去甚远，堪称冷落。外媒对此倒是反应灵敏，“西报记者、日本记者却有十余人”前来捧场，不过他们感兴趣的，却是孙先生究竟带了多少款子回国。

1912年1月1日，孙中山赴南京就任总统，上海火车站送行的也只有于右任、蔡元培、陈其美、沈翔云数人，另有军乐一队、卫兵一连，仅此而已。以上场面，均为徐宗鉴亲眼所见，似为可信。

### 三分之一总长人选被否决

1912年1月3日，临时参议院（前身即“各省代表会”）再次进行选举，黎元洪不出意料地当选为临时副总统，但在表决孙中山所提出的各部总长人选时，其中有3人遭否决，几占名单的三分之一。

孙中山流亡海外多年，国内情况不甚熟悉，名单主要由黄兴拟定，人选如下：黄兴自任陆军总长、黄钟英任海军总长、王宠惠任外交总长、伍廷芳任司法总长、陈锦涛任财政总长、宋教仁任内务总长、章太炎任教育总长、张謇任实业总

长、汤寿潜任交通总长。

被否决的3人分别为宋教仁、王宠惠与章太炎，参议员们的反对理由是，章太炎脾气怪诞、性格孤傲，宋教仁心高气盛、年纪太轻，王宠惠海外归来、阅历尚浅，均不合适担当重任。孙中山来时原本兴致盎然，不料第一次开会即受此难堪，最后只得默然退场。事后，黄兴多方协调，新名单以程德全换下宋教仁、用蔡元培换下章太炎，这才勉强通过。

### 湖北首义派与同盟会对立

人选名单出炉后，不满者不在少数。首先是湖北首义派，他们在总、次长的十八人大名单中竟无一人上榜，这未免有些说不过去。陕西革命党人、《民立报》的主持者于右任曾向黄兴提醒，名单酝酿时应考虑容纳武昌首义的革命同志，但“首义派”最后还是颗粒无收。

从潜意识说，这恐怕与名单主拟人黄兴在武昌的不愉快经历相关。黄兴的用人有私心，对此，同盟会早期骨干的谭人凤也曾责怪。

事实上，武昌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孙武曾前来活动陆军次长一职，但已任陆军总长的黄兴显然不想用他做副手，孙武最终失望而去。另一位首义者张振武对南京临时政府也极其不满，每次见面，张都要撸起袖子、挥动胳膊，嚷嚷着说黄兴办事不公平。名单公布后，张振武更是在报纸上公开辱骂：“你们这些人碌碌无为，依靠别人成功了，权力却都被你们拿去了！”由此，湖北首义派走上与同盟会相对立的道路。



左为孙中山，右为章太炎

### 章太炎被否而发飙

至于财政总长，黄兴原主张用名声在外的同乡熊希龄，但孙中山坚持用留美博士陈锦涛。外交总长的人选也争议颇大，按说应由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出任，但孙中山最终选择了王宠惠。王、伍两人都是法学博士出身，但王宠惠年仅31岁，资历、经验远不如伍廷芳。为此，王宠惠最初不敢受命，但孙中山却给他打气：“吾人正当破除所谓官僚资格，外交问题吾自决之，勿怯也。”

伍廷芳的反应倒还算豁达：“予视两者（指外交与司法总长职位）无甚差异，无所好亦无所恶。”但数年后，伍廷芳却隐约表达了自己的积怨，称孙中山当年任用留学生“不加甄别”。

胡汉民自传中说，孙中山回国前，宋教仁有意推黄兴为大总统而自任内阁总理，章太炎也为之公开造势：若举总统，以功则黄兴，以才则宋教仁，以德则汪精卫。在这次的表决中，宋教仁落选的原因有二：一则年少，二则太坚持原则。为

实行内阁制的主张，他不但与孙中山吵，而且与临时参议员们吵，由此受人恶感，被否并不奇怪。

至于另一个被否的老革命党章太炎，他可就要发飙了。章原本就脾气怪异，这次革命，他上蹿下跳，活跃异常，结果却什么也没捞着，那当然不干了。两个月后，南京的川籍革命党人举行四川革命烈士悼念会，人在上海的章太炎居然不辞辛苦地送来一副极刺耳的挽联：“群盗鼠窃狗偷，死者不瞑目；此地虎踞龙盘，古人之虚言”。此骂非无所指。

由于存在时间短、经费奇缺等诸多原因，南京临时政府当时可做、能做、已做之事并不多，特别在清帝退位已成定局之时，更是如此。按之前各方的约定与默契，清廷发布退位诏书的次日，孙中山即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，袁世凯随后被举为临时大总统。

摘自《门槛上的民国》（新星出版社）

## 冯玉祥读书与时俱进

查一路

冯玉祥是民国时期军事家、爱国将领、著名民主人士，原籍安徽巢县，寄籍河北保定，与蒋介石是结拜兄弟。

他幼年失学，只正式读过几个月的书。吃粮当兵后，才渐渐意识到，要想跟上形势非得有相当的文化水平不可。

于是，他昼夜苦读，传为佳话美谈。其中几个故事很有趣。据说，为了不影响别人休息，他在空木箱上挖个洞，内放蜡烛，伸头进洞里去夜读；为免人打扰，在门前挂一块牌，上书“冯玉祥死了”，不读时再翻过来，上面写着“冯玉祥活了”。

冯玉祥不仅仅是苦读，读书还十分得法，什么阶段读什么书，他处理得丝丝入

扣。所以每个阶段的阅读，都能够有助他更新思想，裨益人生。

最初，他爱读《三国演义》，听评书，读一些有关忠孝节义的故事书，这些浅显的书，很适合和提升他最初的文化程度，同时也让他知晓了一些常识、古圣先贤的道理和忠君爱国的思想。这个阶段的阅读，他结合着认字，打基础，为后来的深化做准备。

随着文化水平的提升，同时也基于现实的需要，他的阅读进入了中级阶段，一改过去一味接受，进而想从书中寻找济世良方。那时他当了团长，听牧师布道，觉得牧师的博爱和利他很伟大，这时候他大量寻

找和阅读有关宗教方面的书籍，想从中找到一个新世界的宏图远景，以此来改造当时的社会。

“五卅”惨案的发生，现实让他在痛苦中思索。于是，他开始阅读孙中山的《三民主义》，意识到孙中山的博学与雄才，孙的学问是从古今中外的各种学说中抽绎出来的，很符合当时的国情和民情，是救国救民的真理。从孙中山的《三民主义》开始，冯玉祥热衷于读新书。此时，他意识到原来笃信的那些基督教理想，只是空中楼阁。由此，他的思想得到更新，新思想澄清了旧思想，他的精神世界也随之越来越明亮。

到了后期，经过无数次失败，他开始放弃自己先前主张的“好人政治”的“人治”，又开始系统阅读介绍社会主义的新书。为此还专门成立研读社会主义学说的研究室，延请李达、白鹏飞、王季谷等人为他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、政治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，每次授课冯玉祥都听得格外认真。课后，再认真研读、思考，并在书籍上留下大量的圈点和批语。

正是由于这种阶梯式的读书法，让他不断地学习到新的学说和思想，到了晚年仍能把握正确的社会潮流和方向，与中共为友。可以说，他一生吐故纳新，坚持进步，与他得法的读书生活有很大关系。